一　治世语

古人把‘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’作为人生的四个阶段性目标。修身是基础，平天下是目标。有才能有抱负的人，都希望通过读圣贤书而实现治国、平天下的宏大理想。只是，有的人想得比较实际，而有的人则比较实心眼儿，把骗人的话也当成真话，把理论性的目标也当成了现实。这就有了我们所说的“迂人迂语”。所谓“治世语”，便是这些道德高尚的先生们关于治世平天下的宏论。

得士者昌，失士者亡。魏有一士曰孟子，有一士曰乐毅。得乐可霸，得孟可王。二士在魏而乃相犀首与张仪,是犹舍照乘而玩蜣丸。不智甚矣。惠王既卒，孟子去魏而适齐；燕昭礼贤，乐毅去魏而适燕。二士既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去，魏何以为国？乐未去魏，阵先至齐，而燕大乱。盖尝以汤武之事劝齐矣。然齐终无兴灭继绝之举。使齐移薛公之位以位孟子，孟子岂但为一薛公而已哉。王者之佐有言无位，宣王不得为桓公矣，况汤武乎？及其致为臣而归，曰：“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！”此千古之痛也。

明·马中锡

《峄言》



得到人才就一定会兴旺，失去人才就一定要败亡。魏国有一个士人叫孟子，有一个士人叫乐毅。得到乐毅，就可以使自己的国家称霸于天下；得到孟子，就可以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天下人所向往的王道乐土。这两个人才都生活在魏国，可是魏国却任用了犀首与张仪

两个人做宰相，这简直就是放弃手中的明珠却找了一个屎克郎来玩儿。简直太不聪明了。魏惠王死了以后，孟子离开魏到了齐国；燕昭王对人才比较尊重，乐毅也离开了魏国到了燕国。这两个人才都离开了，魏国还指望什么来兴盛自己的国家呢？

乐毅还没有离开魏国的时候，孟子已经先离开魏国到了齐国。那时候，燕国正在大乱。孟子就以汤武时代的政治来劝告齐国的国君。可惜，齐国最终也没有采取继承三代之治，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举动。如果齐国把薛公的位置让出来给孟子，孟子所能做出的成就，难道是薛公那样的人能比得上的吗！（像孟子那样）能辅佐帝王的人才，只能提建议而没有实权，所以齐宣王最终也不能成为齐桓公那样的霸主，更别说成为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贤君了。后来，孟子离开齐国的政治舞台回家养老时，说：“老天爷没有想让天下太平统一呀！如果真的想让天下太平统一，在如今这个时代,除了我,还有谁能担负起这样的重任呢?”这可真是永恒的感叹呀！

曾凡氏曰：古来士人，以天下为己任。所以，孟子“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”之语,堪为豪言壮语。然而也难免迂腐之讥。原因在于，人家本不想用你那一套仁义的说教来治天下，你却自以为非我莫属。那岂不是迂吗？马先生之语就更不堪了。战国战乱时期，你要国君都放下手中的权力和眼前的安危,去学什么“王道”,岂不是痴人说梦？张仪、苏秦之流，固然不像孔孟之徒

那样高雅，但对治理天下来说，确实是比孟子之徒不知现实多少倍。哪个君王肯为了抽象的仁义去拿一个国家做哲学家、道学家的试验品呢？

今罪责官吏，殊无养士君子廉耻之道。必断言徒流杖数，赎之以铜，便非养士君子之意。如古人责其罪，皆不深指斥恶，如责以不廉，则曰‘俎豆不修。

宋·程颐

《程氏遗书》卷十



现在朝廷惩罚官吏，太不顾及士人、君子的脸面，太不利于士人、君子培养自己的廉耻之心。非要明确地计算出犯罪的人应当受的处罚，然后又要人拿钱赎罪，这做法就不是诚心在培养士人的道德。比如古人，责备人犯罪时，都不是明确地指出人家的过错。如果说谁不廉洁时，仅仅是说他‘俎豆不修’而已。

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。歆谓之曰："今当举六孝廉。多贵戚书命，不宜相违。欲自求一名士以报国家。尔助我求之。"

歆之意亦可怜矣。虽然，歆亦有罪焉。伐国不问仁人。使歆能为尹翁归、于庭尉，虽贵，其敢干之以私耶？晋颜含有言曰："冯祖思问佞于我，我岂有邪德乎？歆自反焉可也。"纵未及此，贵戚有命，如其所托之非人，以情却之，政复何害，何至拂我之情，以强从人欲哉。昔东汉吴植为宛令，梁冀以宾客托之。植曰："明将军处上将之门，宜崇贤善，以补朝阙。自侍坐以来，未闻称一长者，而多托非人，诚非敢闻。当是时，冀以贵戚用事，可谓有权，而植却之无难色。今歆雇以贵戚之命，重于相违，乌得无罪？蚤然，朝廷欲天下荐举之公，而使所得者皆得其人以报国，惟申严嘱托之禁，而后可望其至焉耳。不然，缘情徇私，徒长奔竞，未见其可也。

宋·葛洪

《涉史随笔》

河南府的府尹田歆，有个外甥王湛，以善于知人而著称。田歆对他说："最近，我应该向朝廷推荐六个孝廉。可是最近收到了许多皇亲国戚的推荐条子，不好拒绝他们。我想自己寻找一位真正的名士，以报答国家。希望你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。"

田歆的想法也真够可怜的了。不过，即使是如此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田歆也还是有罪的。欲话说“伐国不问仁人”，即处理国家大事不用征得先辈、老师的同意。如果田歆能像尹翁归和于定国那样做事，虽然是皇亲贵戚，谁又敢来向他求私情呢？晋代颜含曾说过：“冯祖思向我请教取悦于上司的技巧，难道我是那种品德很坏的人吗？否则，人家为什么来问我呢？田歆就应该这样地自我反问。’就算不能做到这种地步,贵戚来托情,如果所托的人不合适，也可以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嘛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何至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，以勉强地屈从他人的欲望呢？过去东汉的吴植做南阳县令时，权贵梁冀托他关照自己的宾客。吴植说：“将军您处在重要的军政岗位上，应该推崇贤人善士，以补充朝廷的人才。可是，自从我处于您的领导之下以来，没有一次听说您称道和推荐一位长者，反而经常托一些不适当的人来谋求职务。我真是不敢接受您的推荐。”在那时，梁冀以皇帝亲戚的身份当权执政，确实称得上是有权，而吴植

回绝他时却一点也不觉得为难。现在，田歆却因为对方是贵戚，就觉得难以违抗反驳，怎么能说是没有罪呢？

当然了，朝廷若是真的想让天下都出以公心来推荐人才，而且想让得到的人才都能发挥作用，必须首先严格地规定不许请客、托人、走后门。只有这样，才有可能杜绝弊端，吸引贤人出来报效国家。否则的话，到处都是托人情，走后门，徇私舞弊，只能助长歪风邪气，肯定不会为国家招来任何真正的人才。

曾凡氏曰：绝对真理，常常意味着是做不到的真理。所以，人们会发现“迂言”，有时，甚至经常，就是绝对真理。

传曰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。”荀子乃曰“楚王好细腰，故朝有饿人。”墨子又曰“楚王好细腰，国多饿人。”《淮南子》亦曰“灵王好细腰，民有杀食而自饥也。”人君好细腰，不过宫人，岂欲朝臣与国人皆细腰乎？天下之事，讹谬之远，大率如此。岂独细腰事乎？

宋·王楙

《野客丛书》卷二

《易传》说“楚王好细腰。宫中多饿死。”荀子则说：“楚王喜欢细腰的美女，所以当时朝中的许多人都因此而饿死了。”墨子又说“楚王喜欢细腰美女，楚国到处是饥饿之人。”《淮南子》亦曰“楚灵王好细腰，老



百姓中就有为了节食而宁肯自己忍饥挨饿的。”实际上，君主喜欢细腰美女，那是他自己对宫女的选择标准，难道是让朝中大臣和全国的老百姓都去节食，都变成细腰吗？天下的事，许多极荒唐的错误，都是这样造成的。岂止是一个细腰之事！

曾凡氏曰 看来,此公是把‘楚王好细腰’当成单纯的个人爱好了。不然，这位先生为何不怪皇帝，却来怪老百姓？既是就“天下的事”，就不能如此简单地归因于个人爱好，特别是不能把皇帝的个人爱好当成是个人爱好。一个皇帝想把全世界的版图都划归自己名下，难道也是自己的个人爱好吗？

先儒谓，天下宁可无魏徵之事业，而不可无君臣之义。予亦云。

清·王豫

《蕉窗日记》卷一

儒家的先辈说，天下宁可没有魏徵那样的事业，但不能没有君臣之间的礼义关系。我也这样认为。

自古圣贤，不贵难得之物，况遐方生鲜异味，其传送之艰尤有日不忍见，耳不忍闻者乎？故语及伤害，虽荐奉宗庙之物，亦敕勿复献。此大君之美德，而史册所必书也。

清·尹一会

《四鉴录·君鉴录》卷一



自古以来，圣贤对难得的东西并不看重，又何况远方的生鲜物品，传送起来那么不容易，有许多目不忍睹、耳不忍闻的苦处难处。所以，一谈到可能造成的伤害，虽然是用来祭祀的东西，皇帝也下旨不要求再进贡了。这才是大君的美德，而且是史书应该大书特书的呢！

曾凡氏曰 旧例,岭南要为皇帝献新鲜龙眼、荔枝。汉代有一位临武长叫唐羌，他给朝廷上书说：这事劳民伤财，死人太多，请免了这种差事。皇帝下诏说：远来的这些珍品，本来是为了给宗庙祭祀用的，既然对人民有伤害，那就免了吧。所以，我们这位老实的学者就把此事当成了皇帝的一大美德，要大书特书。

吏能弘厚，虽贪污放纵，犹无所害。唯苛察之人，身虽廉,而巧黠刻剜,毒加百姓。

宋·宋均

引自《宋稗类钞·吏治》

做官的人，只要为人宽厚，肚量大，即使有点什么贪污腐化之类的毛病，也不大要紧。只有那些非常苛刻、精明细致的人，自己虽然可能廉洁，可是却刁钻刻薄，对老百姓的危害最大。

曾凡氏曰：似是而非语。苛察者便是雪地北风，当然令人切齿;弘厚 '而贪污者,实在是餐桌上的老鼠，肚腹中的蛆虫，怎可说是无害？特别是现代中国人都熟悉的“老子一贯正确”，还不如那种让人一眼就看出的明显的坏蛋好对付。

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。其党送归私第。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：“天子不可令闲，常以奢靡娱其耳目，使日新月盛，然后吾辈可以得志；谨勿使

之读书，亲近儒生。彼见前代兴亡，心知忧惧，则吾辈疏斥矣。”

甚矣人君之不可不学也。国家之隆替，社稷之安危，天下之治乱，生民之休戚，君子小人之消长进退，天命人心之去就离合，其端皆基于人君之学与否耳。君诚有志于学，则所闻者正言，所讲者正理，所亲者正人，所履者正行。知古今成败之所由来，而常有惧心；审忠邪关系之不可忽，而常有戒心。制其所治于未乱，保其邦于未危。日就月将，以至于缉熙光明之地。彼觇真怒，候惨舒，动中主情，举无廖旨，如仇士良之徒，自无所投其隙。如此，则藏否毁誉，皆可得其真；功负赏罚，皆可得其当。而跻斯世于太宁之域矣。不然，则本心不正，而脉理皆邪，岂独此曹得以固其权宠而已哉。

宋·葛洪

《涉史随笔》



左卫上将军、内侍监仇士良该退休时，他的党徒在他的私宅为他开欢送会。仇士良教给他们巩固自己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位和使自己受到宠信的窍门，说：“决不能让皇帝有闲的时候，必须经常以那些奢侈豪华的事物去吸引他的耳目，让他每天都保持新鲜感，常玩常新。这样，咱们这种人就可以得志了。千万注意不要让他读书，不能让他接近那些儒生。他如果看书多了，发现了前代兴亡的道理，心理上产生了恐惧感。我们这种人就该受到排斥了。”

看起来，学习这件事，对于君主来说是太重要了！国家的兴旺，政权的安危，天下的安定，老百姓的生活，君子与小人的势力消长，天命人心的去就离合，最根本的都在于做君主的是否学习。如果君主有真心想学习，那么，所听到的都将是正派的言论，所讲出来的话都将是正派的道理，所亲近的都是正派的人，所走的都是正确的道路。知道古今成败的由来，因而常常谨慎从事；明白忠正和奸邪之间的关系不可忽视，因而常常保持警惕；在动乱未发生之前就杜绝它，在国家尚未发生危险时就保证它的安全。这样，一天一天，一月一月地不断地努力下去，慢慢地就会达到光明的地步。那些靠观察君主的喜怒，把握朝政变化的时机，迎合君主的意志，投合君主的爱好，像仇士良之辈的人，也就再也没有办法钻空子了。这样，大臣们在朝中对人的批评还是表扬，都将是真诚的真实的；皇帝对大臣们的功罪的赏罚，也都将是恰如其分的。而国家也就因此而进入了真正的太平盛世的境界了。否则，朝廷的整个精神、气氛从根本上就不正，做事的种种规矩都是按照

歪门邪道进行的，那结果绝不仅仅是仇某人这种人得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已！

曾凡氏曰：真是聪明人的聪明主意！不知仇士良本人看了该如何说？

汉高祖初为亭长，告归之田。有老人过请饮。因相吕后及孝惠帝、鲁元公主，皆大贵。及见高帝，乃曰：“向者夫人、儿女皆以君，君相贵不可言。”高帝谢曰：“诚如父言，不敢忘德。”唐太宗方四岁，有书生谒高祖曰：“公有相法，贵人也。然必有贵子。”及见太宗，曰：“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其年弱冠，必能济世安民。”书生辞去，高祖使人追而杀之。

杀之是也；先儒谓其德色如汉高祖者，非也。何者？古今欲为不义，求福于非望者，多起于佞人之谀词。有以激发而成之。当秦隋将亡之时，欲为汉祖、唐宗之所为者，不知其几；为父老书生之谈者，亦不知其几。彼父老书生，偶验于二帝耳，安知其不以告他人哉？以是告他人，而不验者多，是激发他人求福非望，以陷于祸败者亦我。嗟夫，匹夫狂言，天下受祸，其罪可胜诛哉！追而杀之，唐高之远识，过汉高万万矣。史乃谓唐高之追杀书生，惧其语泄，理亦有之。第其意虽私，其事则是。如以为德色，不过女子小人歆慕富贵之心；英雄如季，而肯遽德色于偶然之虚誉乎？

明·张萱

《疑耀·汉唐二高识度》

汉高祖刚当上亭长时，有一次请假回家去种地。有一个老人从他家田边路过，向他家要一点水喝。老人喝水时为吕太后和惠帝、鲁元公主相面，这几个人都是大富大贵的面相。后来又见了汉高祖刘邦，立刻说：“刚才的夫人、儿子、女儿，都是因为您才有贵相的。先生的面相，贵不可言。”刘邦感谢说：“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一定不敢忘了你今天的吉言。”



唐太宗四岁那年，有一个书生来见唐高祖李渊，说：“您按照相面之术来看，属于贵人之相。不过，您必定有一个大贵人的儿子。”等过了一会儿，见到了太宗李世民，于是说：“这位公子具有龙凤一样的姿态，阳光一样灿烂的仪表，等到日后长大成人，必定能够拯救天下，安顿老百姓。”过了一会儿，等这个书生告辞以后，李渊派人追上去把他杀掉了。唐高祖杀掉那个书生是对的。不过，先儒说他的德性度量像汉高祖，这话可就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从古到今，想做不义之事，以达到

非分之想的人，大都起因于小人的阿谀奉承，被人一吹捧，才做出了过分的举动。在那隋朝即将灭亡之际，天下想做汉高祖、唐太宗那种事的人不知有多少；到处传播那位老人或书生那种言论的人，也不知有多少。那个老人和书生的话，仅仅是偶然在汉高祖和唐太宗身上应验了。谁知道他们究竟同样的话对多少人说过。拿那种话告诉别人，当然是不应验的多。那也就等于是鼓励别人去追求非分之福，做不可能的梦，让人陷于灾难之中。那么，身受其祸的人也就不在少数。唉，匹夫随口胡说八道，天下的人就跟着他们蒙受灾祸！这种人的罪过，简直是杀头也不足以抵偿！唐高祖能命人追上那书生，把他杀掉，这种见识，超过汉高祖岂止是万万倍呀！史书上说，唐高祖之所以要杀掉那个书生，是怕他到处传播，泄露了机密。从道理上说，这也是可能的。不过，他的出发点虽然可能是自私的，但那种做法却是很正确的。

不过，如果把这个举动也当成是君子之德就过分了；那不过是女子和小人的羡慕富贵之心而已，像刘邦那种英雄人物，怎么会随随便便地轻信人家偶然说出的阿谀之词呢？

曾凡氏曰 这种事,信亦可,不信亦可。即如刘邦，也并非不信。陈胜、吴广起义时，还特意到处传播童谣，让天下人都知道自己要当皇帝。唐高祖也不是怕泄露自己可能当皇帝的秘密，而是怕他泄露自己准备当皇帝的野心。既然以此说唐高祖胜过汉高祖万万倍，

又说汉高祖根本不信这种胡说，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

今日西事要已，亦有甚难？前事亦何足耻？只朝廷推一宽大天地之量,许之自新,莫须相从。然此恐未易。朝廷之意,今日不得已,须著如此。但夏人更重有所要,以坚吾约,则连患未已也。范希文前日西举,发虚声而走敌人。今日又不知谁能为之？

宋·程颢

《程氏遗书》卷二

现在，西部边境上的事要想了结又有什么难的呢？以前的事又有什么可耻的呢？只要朝廷能拿出天地一样宽大的胸怀气魄，允许他们自己改过自新，不要再继续犯边就行了。不过这事也恐怕不容易办到。朝廷的意思，好像是如今不得已，才同意暂时先采取宽大政策。但西夏朝的人如果再继续向朝廷提出其他要求，那就后患无穷了。范仲淹先前带兵西征，靠虚张声势而吓走了敌人。现在也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出同样的事呢？

注：“发虚声而走敌人”说法不确。范仲淹是经过长期休养生息，训练军队，增强宋军实力后才迫使西夏和谈的。

曾凡氏曰：某些大儒专好信口胡说，一厢情愿，自以为是。范仲淹为什么能凭“虚声”吓走敌人？宋朝又为什么一败再败？难道仅仅凭着道德就能解决世间的

一切吗？

太后之将奔也，皇上求之曰：无须出走，外人皆友邦，其兵来讨拳匪，对我国家非有恶意。臣请自东交民巷,向各国使臣面谈,必无事矣。

清·光绪皇帝

引自《近代稗海》第一辑

太后将要逃跑时，光绪皇帝求她别走，说：不用出走。那些外国人都是咱们的友邦，他们的军队都是来讨伐义和团拳匪的，对咱们的国家绝对没有恶意。我愿意亲自到东交民巷，去和各国的使臣面谈。肯定就没有什么事了。

曾凡氏曰：此种言论出自一国之君，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。外国军队来我国讨伐我国的地方武装，而本国国君要亲自去向人家求情。且不论“外交”上如何，人家既然费力来了，又怎肯为了一句好听话就罢手呢？

自光绪元年至十八年为兄弟不和时代，自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为母子夫妇不和时代，终帝之身，两事相为首尾凡三十四年。自古国家之败多起于伦理，家齐而后国治，不诚信哉。

近代·胡思敬

《国闻备乘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